

浙江难题

ZHEJIANG 邹建锋◎著

DILEMMA

破解转型乏力缘由，寻找浙江真实坐标

赶超江苏缘何落空 转型发展瓶颈何在 兄弟省份如何借鉴

《中国经济观察》、《中国工商时报》

新浪网、凤凰网、天涯社区等媒体

鼎力推荐！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浙江 难题

ZHEJIANG
DILEMMA

邹建锋◎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难题 / 邹建锋著. —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80234-777-9

I. ①浙… II. ①邹…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浙江省 IV. ①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4824号

书 名: 浙江难题

著作责任者: 邹建锋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777-9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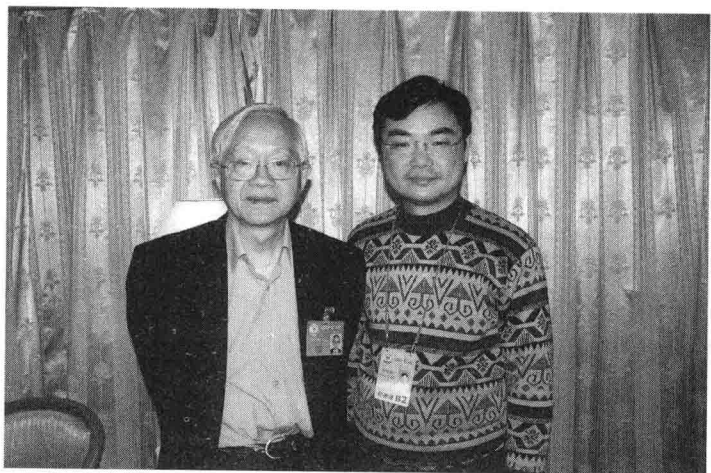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pres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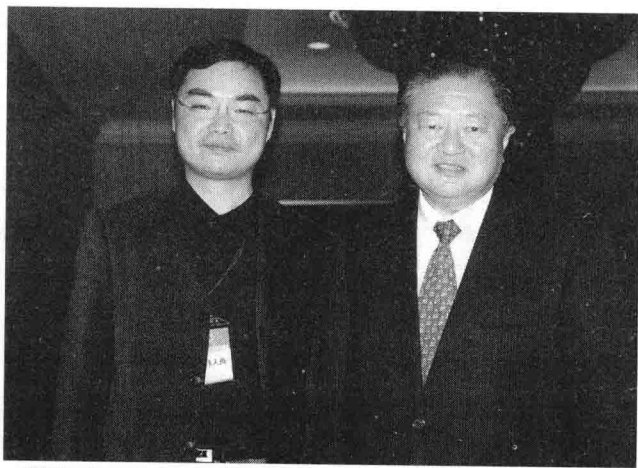
电子邮箱: 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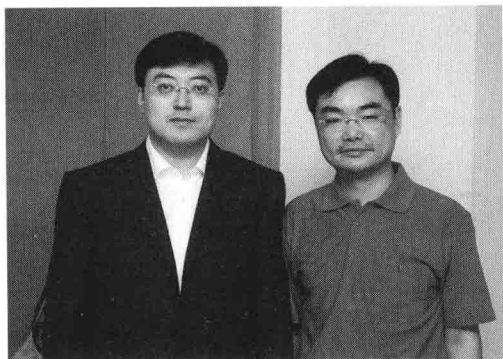
采访经济学家吴敬琏
(2005年全国两会)



采访台湾著名企业家
——台达电子董事长郑崇华
(2005·上海)



采访娃哈哈集团
董事长宗庆后
(2006年全国两会)



采访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
(2007·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



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交流
(2007年)



在韩国贸易协会采访
(左三为韩国贸易
协会副会长安玹镐,
2012年5月·首尔)



采访万向集团
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2013年11月)

浙江经济的失落无疑值得反思，但这并不是一本唱衰浙江经济的书，而是通过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遭遇的挫折、挑战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寻找浙江当下的真实“坐标”。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浙江经济一度“野蛮生长”，迅速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并且在传统制造业、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民生保障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领先全国。但是必须看到，经济飞速增长的势头近十年来已经悄然减弱。而兄弟省份中，不仅中西部地区在努力地“弯道超车”，而且江苏等沿海经济强省依然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

2012年，浙江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美元^①。近年来笔者也听到不少人士自豪地声称浙江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西欧”或者“至少在亚洲可排在前列”。但是按照人均GDP看，浙江不仅远低于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也明显低于中国台湾（20328美元）、韩国（23113美元）、中国香港（36667美元）等国家和地区。

从更广的视野看，浙江人均GDP还低于在很多浙江人眼里“不过如此”的马来西亚（10304美元）、土耳其（10609美元）、墨西哥（10247美元）、阿根廷（11576美元）、巴西（12079美元）、波兰（12538美元）、委内瑞拉

^① 本书付梓之际，《2013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正式发布，但是因为2012年是浙江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的标志性年份，而且2013年浙江宏观经济形势并无明显“拐点”出现，所以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比较，本书仍采用截至2012年的数据。

(12956美元)……^①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进度表”，到2020年浙江的GDP总额、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要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

由此可见，浙江经济的发展还任重道远。随着中国经济“第二季”大幕的开启，曾创造无数奇迹的浙江经济也应该尽快摆脱近年来出现的彷徨，在新一轮改革和发展中获得新动力和新红利——这是笔者作为一个浙江人的强烈愿望。

大楼建起，经济倒下？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2013年夏天，笔者赴温州采访，望着曾获得“浙江第一高楼”桂冠却又命运多舛的温州世贸中心，脑海里突然跃出了这两句话。

2008年7月，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主体结顶，成为当时浙江摩天大楼的新高度。2012年6月，随着宁波城市之光商业综合体举行开工典礼，总高度455米的城市之光A塔将在数年后刷新这一纪录。但“城市之光”未必是浙江摩天大楼的终极纪录——在2012年世界温商大会上，总高度508米、101层的温州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摩天大楼纷纷动建，无疑体现了浙江经济赶超世界发达水平的强烈愿望，而这些超级建筑的落成也难免给很多人制造了浙江经济已经“赶英超美”的错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浙江各地近十多年掀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譬如330米的杭州国际办公中心、288米的绍兴世茂天际中心、288米的湖

^① 以上与浙江比较的数据源自公开发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览2012》（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12”）。

州东吴国际广场、260米的台州天盛中心、260米的义乌世贸中心、202米的嘉兴中成希尔顿国际大酒店、196米的舟山港航国际大厦……

摩天大楼的建设一般都以投资巨大、周期漫长著称，每一幢大楼的诞生不仅都会有自己的曲折故事，而且还可能与地方经济发展周期产生某种瓜葛。譬如温州世贸中心尽管已经封顶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交付使用，在这座纠纷、诉讼缠身的摩天大楼背后隐藏着众多的风云际会乃至商界恩仇。而联系到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经济近年来遭遇的困境，温州世贸中心的命运则难免令人想到“大楼建起，经济衰退”的“劳伦斯魔咒”。

“劳伦斯魔咒”又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源于德意志银行证券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总结的“摩天大楼指数”：摩天大楼建设与商业周期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因为摩天大楼不仅建设成本惊人，而且其自身运营往往入不敷出，很难收回投资，所以这类大楼的开建多是政府经济政策鼓励的结果，不可避免有泡沫成分。而大楼建成之日一般也是经济泡沫破灭之时。

劳伦斯的观点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获得了诸多印证：1908年前后，纽约新加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落成，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1931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此时经济大萧条正向全球蔓延；1973年竣工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分别以541.3米和527.3米成为当时全球最高建筑，随后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1998年，吉隆坡双子塔楼超越西尔斯大厦成为全球冠军，而此时正值亚洲陷入金融危机；2003年，中国台北101大楼建成，其时代背景却是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股市狂泻……

2008年温州世贸中心正式封顶仅2个月后，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升级并严重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以高外向度著称的浙江经济遭遇正面冲击。

以温州为例，2008年的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锐减至8.2%，随后的4年间，除了2010年达到11.1%之外均未超过10%，至2012年更是降到6.5%，并且出现了众多经济指标在全省垫底的情况：在16个经济主要指标中，人均GDP、GDP增速、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指标倒数第二。

坏消息接踵而至：继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13年温州又以房地产“崩盘”再度引发国内外的瞩目。至2013年8月，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4个月下跌，一些豪华楼盘售价更是从高峰时的每平方米四五万元直线下滑到了2万多元，按揭购房者弃房断供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众多中小微企业的不景气甚至停产、倒闭则使温州被认为是“浙江制造”乃至“中国制造”困境的典型。

温州经济所遭遇的暗流是浙江经济面临难题的写照，而且其养痍遗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当时浙江经济尽管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但是不断遭遇电力、土地等要素的严重短缺，用工荒也初露端倪，房地产价格甚至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大量游资出现……与此同时，不断遭遇“天花板”困扰的诸多浙江民营企业掀起了外迁的高潮。对此，浙江各级政府显得颇为“开明”，公开鼓励企业“跳出浙江求发展”——而这种宽厚和开明的背后，又何尝不是无奈和无策！

本书搜集整理的众多数据显示，2004年是浙江在全国经济坐标系中的一个拐点：浙江在2004年达到一个高峰之后，虽然依旧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但是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相比，却逐渐显现出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问题。增速超越浙江的不仅包括一些经济后发、基数较小的中西部省份，也包括强邻江苏：2004年之前的江浙“赛马”中，浙江的经济增速曾多年保持领先，GDP总额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一度有学者预测浙江经济总量有望在2008年前后赶上江苏。但是2005年至今，浙江增速除2011年之外均明显落后于江

苏，在全国的比重也逐渐回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当年浙江经济不仅在总量上与江苏进一步扩大差距，而且人均GDP也被江苏超越！

2008年以后，浙江经济多年来落下的“病根”终于全面暴露。而2011年以来，随着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急剧反弹，不良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这个金融生态领域的“优等生”迅速成为“差生”，蜕变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此外，浙江多年来引以为豪的“藏富于民”政策似乎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背后则正是创业土壤和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

失落与反思

作为成长于浙江的财经记者，笔者自十多年前有幸与《中国经济时报》结缘以来一直关注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期间又有五年时间在北京和上海工作，既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浙江，又有机会“跳出浙江看浙江”。正因为如此，早在若干年前人们还热衷于关注浙江经济的“好消息”的时候，笔者就非常担心：随着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环境承载力、廉价原材料、市场空间等“奶酪”消耗殆尽，浙江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标兵”重返“小兵”行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浙江经济悄然失落？笔者在十多年来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粗浅的归纳：

第一，“浙江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但是这种模式的制度先发优势逐渐泯灭，而民营经济转型发展亟须的制度、政策空间相对狭窄。譬如经过前二十多年的发展，大批浙商在相对低端的制造业领域完成了相当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些产业资本的最佳出路是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成为浙江经济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玻璃门”、“弹簧门”等外因加上资本逐利的

内因，大量的浙江民间资本成为投机资本：无论是炒房、炒矿，还是“豆你玩”、“蒜你狠”，抑或证券市场的“涨停板敢死队”，都闪现着浙江游资的魅影。

与此同时，随着财富的积累，不少政府和部门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而是越来越喜欢“把手伸进企业的怀里”。可以说，浙江经济在起步阶段得益于放水养鱼、放手发展，实现了草根力量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而随着民间和政府力量的此消彼长，经济社会发展也就难免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

第二，企业自身经济理性和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之间发生错配。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对于民间资本而言，哪里赚钱容易就奔向哪里是无可厚非的。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逐渐告别短缺经济，以吃、穿、用为主的浙江制造业把目标投向了国外市场，得益于浙商的勤勉和精明，加上发达经济体对廉价商品大量需求的“土豆效应”，浙江这个资源和人口小省迅速成为出口创汇大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在省内创业受制于要素短缺，浙商又纷纷外迁……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国外市场代替国内市场，还是以省外发展代替省内创业，浙江的产业结构都只是实现了“平移”，而“升级”则严重不足。对于企业自身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其天性，但对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三，从产业结构看，欧美、日韩等经济体大多走过了“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重化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路径。一般认为，只有较为完整地经历了上述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工业化并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

从浙江看，除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相对成功，更高层次的环节明显不足，以至于有人认为：“浙江工业化很难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而更为难的则是，缺失的环节很难“补课”，以重化工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不仅钢

铁等传统重化工项目已经受制于环保压力和市场过剩而几乎没有机会，连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等相对高端的行业也早已被兄弟省份抢先实现战略“卡位”。

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固然要大力鼓励新兴产业、大企业、大项目的发展，但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果能够向高端化、精品化、品牌化升级，其发展后劲和财富效应同样不可小觑。

第四，发端于村镇企业的浙江工业化客观上成就了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和小城镇，“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分布于县域的工业化“火苗”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的惯性却制约了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质量，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落地无疑更青睐大城市，服务业则更依赖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可以说，“省管县”体制以及城市化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也制约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五，浙商号称当今中国“第一商帮”，既有名扬海内外的“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也曾因“勇气+运气”占得致富先机。但是生存之惑、发展之惑、传承之惑、参政之惑也挑战着这一既历史悠久又充斥着“新富”、“新贵”的群体。

笔者注意到，号称数百万之众的浙商群体至今鲜有企业领袖出现。有学者指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商业伦理及商业文明的倡导者、遵循者。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家深感自己的责任已经不仅仅是赚钱，还会致力于自己的企业成为健康的社会细胞。换句话说，仅仅关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企业主充其量只能算“老板”或“商人”。相比之下，浙江虽然不乏身家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大老板，但像王石、冯仑那样利用自身影响力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领袖型企业家似乎并不多，也缺乏民国时期像张静江、虞洽卿那样能够推动历史进程的浙籍商界巨子——“小狗”凶猛，却终究推不动历史巨轮，也难言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第1章 地位下滑：无可奈何花落去？ / 1

虽然 GDP 高低并不等同于一个区域的发达程度，但是随着浙江 GDP 总量在全国比重的下降，以及由广东、江苏、山东构成的“第一梯队”越行越远，一种若隐若现的失落感正在浙江人心头弥漫——毕竟浙江曾经暗下决心在总量上超越邻省江苏。而随着近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势头放缓，GDP 总量超越江苏的梦想基本破灭，曾多年领先于江苏的人均 GDP 也被反超。

一、失落的“第一梯队”之梦 / 3

二、江苏不再以浙江为对手 / 10

第2章 “藏富于民”渐行渐远 / 19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浙江各地当政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了“无为而治”、“放水养鱼”、“小河涨水大河满”的理念，使得浙江这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省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模范生”。但是近年来“藏富于民”似乎已经悄然淡出。

一、“过头税”之罗生门 / 21

二、“藏富于民”的尴尬 / 26

附录 2012 年浙江 GDP 增速之谜 / 29

第3章 金融生态恶化：经济“血压”失常 / 41

浙江的金融生态曾经多年处于“全国最优”行列，但是 2011 年下半年之后情况却急转直下，银行坏账纷纷暴露，全省不良贷款率已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前所未有的。

一、前所未有：不良贷款率远超全国平均 / 44

二、温州的故事 / 47

三、反思与出路 / 51

第4章 转轨之痛一：高外向度陷阱 / 55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市场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浙货俏销的局面开始改变。聪明的浙江人发现了比国内市场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大量商品转向外销，这一转向维持了浙江经济不下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站在区域经济的战略层面看，这种转型方式却导致浙江经济错失了升级良机：同时期的广东、江苏、山东等兄弟省份抓住了消费升级的机遇，在家电、汽车、IT等新兴产业领域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被忽略的忠告 / 57

二、市场替代≠转型升级 / 64

第5章 转轨之痛二：“省外浙江”的背后 / 71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逐渐启动，他们的项目需求和浙江的低端制造业“一拍即合”，浙商省外投资兴起，浙江经济却陷入另一个误区：企业经济理性和地区竞争力提升之间发生错配，省外投资（产业转移）代替了转型升级。

一、资本外流“浙江潮” / 73

二、产业转移再反思 / 83

附录 反思“走偏的十年” / 90

第6章 “浙江制造”往何处去 / 103

2003年以后，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抓住了重化工以及“高度加工化”的产业升级机遇，形成了相对合理的产业结构。而浙江的产业升级却困顿于“是否应该走重化工道路”的争论之中。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如何实现升级，也是浙江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重化工”之困 / 105

附录 中国该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 122

二、传统优势产业再出发 / 125

第7章 浙商之惑 / 141

在经济形势犹如烈火烹油般繁荣的时候，企业是来不及困惑的，甚至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而当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之后，众多的企业也就不得不面对各种“成长的烦恼”甚至“生存困境”。

一、生存之惑 / 145

二、发展之惑·闯天涯之难 / 151

三、传承之惑 / 161

附录 《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TOP20 / 162

四、民企老板参政：“红顶”的诱惑和迷茫 / 175

第8章 城市化困惑 / 181

“铺天盖地”式的草根经济造就了浙江改革开放前20年的辉煌，但是小城镇居多、大中城市发展滞后的现象也已经成为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城市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滞后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浙江经济低、小、散的状态。

一、中心城市发展滞后 / 183

二、从强县市到强城市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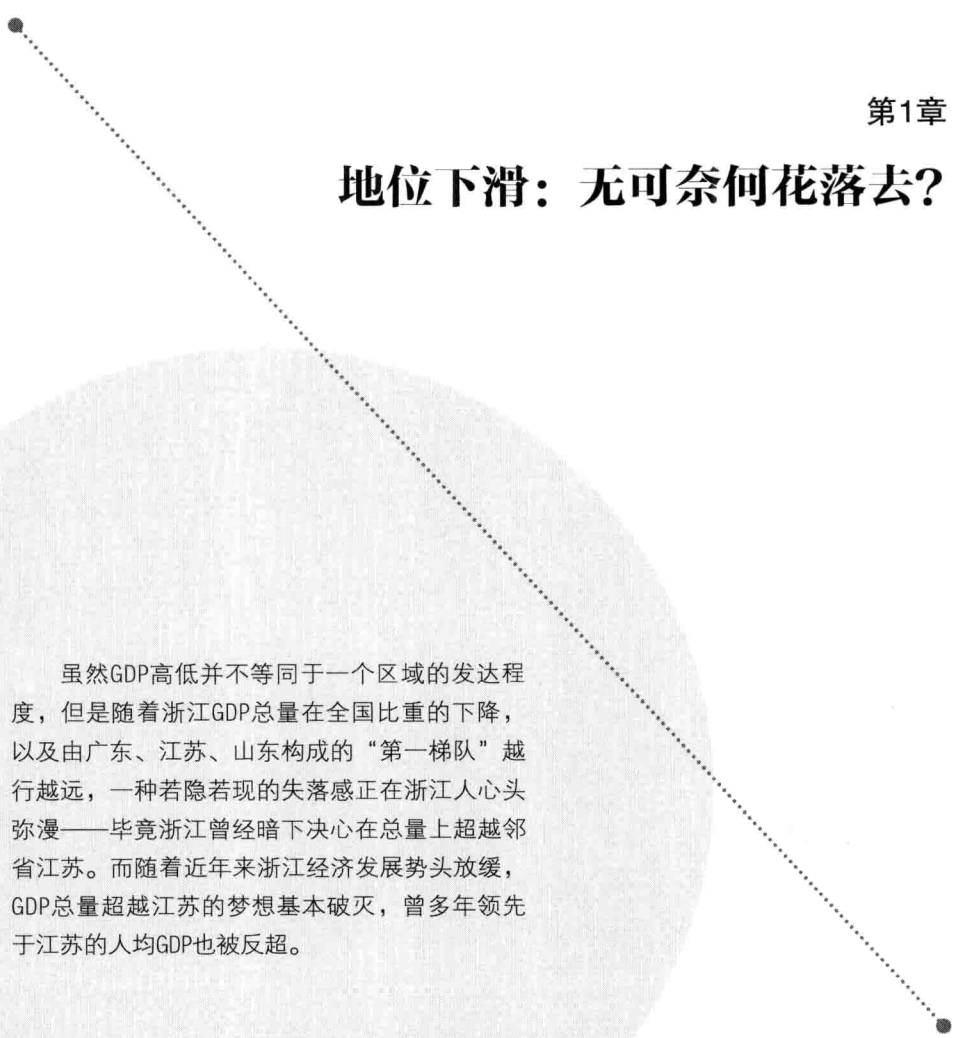
第9章 “浙江模式”再思考 / 211

“浙江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但是这种模式不仅出现了自身动力的衰竭，也遭遇了“中国模式”的逆袭。

一、纠结的“浙江模式” / 213

二、优势再造 / 227

后记 / 251



第1章

地位下滑：无可奈何花落去？

虽然GDP高低并不等同于一个区域的发达程度，但是随着浙江GDP总量在全国比重的下降，以及由广东、江苏、山东构成的“第一梯队”越行越远，一种若隐若现的失落感正在浙江人心头弥漫——毕竟浙江曾经暗下决心在总量上超越邻省江苏。而随着近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势头放缓，GDP总量超越江苏的梦想基本破灭，曾多年领先于江苏的人均GDP也被反超。

